

2007 年 2 月 28 日
立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

陸鴻基教授的陳辭

首先我得感謝各位議員讓我今天有這個機會到立法會交代教統局與香港教育學院的關係。由於我將會向特首委任的調查委員會詳細如實地交代我本月三日在我校內聯網上載文章的指控，這方面的問題，在此不贅了。剛才莫禮時教授提到教統局與高等院校之間、問責與自主之間應有的均衡，如今是傾側了。以下我打算舉七個事例，說明過去幾年間教院在師資培育的公共資源分配方面所遭遇的不愉快經驗。此外，當然還有我校取得自我評審資格之後三年，仍未獲正名為大學的問題。

(一) **“2005 – 08 三年計劃啓動書”**

2004 年 1 月 21 日，教資會向八所公立大學發出“啓動書”，要求大家開啓三年計劃的籌備工作。（大概就是這個時候，莫禮時教授收到我在內聯網文章提及的第一個電話：李國章局長向他說，除非教院採取某些“根本”的行動，否則難逃在三年計劃裏遭受猛削的厄運。）

教院收到的“啓動書”，內有若干令人頭痛的元素；有些是四大師資院校（教院、中大、浸大、港大）共同面對的，在此不贅了。就教院而言，問題包括：幼兒教育證書的學額，從 2006 – 07 年度的 200 名，驟降到 2007 – 08 年度的 0 名；同時，撥給在職中小學教師專業進修課程的資源也大減。這兩項都是跟當時社會人仕非常關注的小學學齡兒童人口下降、縮班殺校無關的。另一方面，“啓動書”提出要大幅度增加全港各院校的小學教育學士名額。由於小學教育學士學生有八成以上就讀我校，我們對此當然感到鼓舞，希望這些新增名額的大部份會撥給我校。莫禮時教授和我們三兩位知道李局長來電的同事都希望猛削的威脅不會實現。

(二) **第二封信**

2004 年 2 月 17 日，一件史無前例的事情發生了。教資會向四所師資院校發了第二封信，提出了跟“啓動書”很不一樣的另一套指示名額：例如，小學教育學士的名額從 1330 名大減至 1050 名，而培訓中學教師的學士名額從 1030 名微增至 1050 名。信中沒有解釋為什麼要做這樣的改動。我們也看不出任何與人口有關的原因——2005 – 08 年度招收的學生在 2009 – 2012 年間畢業，屆時小學學齡人口照理應該已經穩定下來，而中學學齡人口大概仍會收縮。此外，“啓動書”裏幼兒教育證書的 0 名額和在職教師進修課程的削減，在第二封信都沒有改動。

我校同仁根據教資會兩封來信所指示的名額進行規劃，課程和教員人手都難免要面對很大的變動。有些科目（例如設計與科技），根本不可能辦下去了。不少同事的職位恐怕會被裁撤掉。

我們當然希望查出幼兒教育證書的 0 名額到底是什麼原因。一位教統

局高官告訴我們他也不知道；另一位則說這本來是個文書錯誤，但到了高層，就將錯就錯了。我們至今還不曾知道爲什麼。

（大概是這個時候，教院校董會梁國輝主席帶領我校代表到政府總部會見李局長；局長重申教院需跟另一所大學合併；莫禮時教授和我則只答應探討深入協作。）

（三） “名額分配書”

2004年5月7日，教資會發出了各大院校的“名額分配書”，三年週期的策劃告一段落。我校分配得到的“大一名額”從2004-05年度的493名將遞減至2007-08年度的433名。同時，我校與嶺大合辦的“2+2”學位課程（就是每校負責兩年、合共四年的學士課程），不知何故全部撥款將會歸於嶺大，有違同等辦學、同等資助的既定原則。幼兒教育證書的200名兼讀名額雖然獲得恢復，但在職教師進修課程的削減倒沒有舒緩。總之，此役我校承受了共約16%“全日等值”的學生名額的削減。這裏的削減，有部份是源於人口下降的，但也有相當部份是難以用教育的或規劃的原因解釋的。（“名額分配書”多次提到教資會的決定是基於教統局的“指示”（advice）。）但即使大部份的削減都可以找到這樣或那樣的理由，我們還不禁要問，多種的減額在同一個時間削下來，是巧合嗎？

（四） 削資

2004年夏季和秋季，教院同仁致力籌備三年計劃的推行——最痛苦的當然是要裁撤16%的教員，共約60位同事。我們也知道學生名額減少了這麼多，而教資會給新辦院校的“前期額外撥款”也會因爲我校漸臻成熟而逐步取消，因此，削資當會達到20%多。沒想到聖誕前夕有一份報章披露了我校遭政府削減撥款竟然達33%，而這個壞消息到假期後便証實了。

我校員生齊起反對這次削資入骨的動人故事，在座很多位都知之甚詳，不需要在此陳述了。我在這裏只想提出三個關乎幼兒教育和術科的事例。

（五） 幼師教育招標

2005年初的教院削資抗爭，激發了幼兒教育界起來爲他們的同工爭取培訓升格的機會。教統局既不願意增加教資會給幼師培訓的撥款，也不願意順應幼教界的要求在教院多設學額；終於決定拿出鉅款招標，讓不同的機構競投開辦幼稚園教育證書課程。

教資會成立了四十年，有一套確立了和相對透明的辦事程序。教統局的招標則不然。我校每屆中標120名（總名額700餘），而每年報讀我校課程的人數則逾千。教院和競爭對手（浸大校外部和職訓局）大家都不知道中標的準則是什麼，也不知道爲什麼自己得到某個名額。我們在教院只知道2006年城大做的一項獨立調查，訪問了很多幼稚園校長，大多數對教院畢業的教師，較諸其他院校畢業的，評價好得多。

(六) 教統局邀請院校開設幼師課程，漏請教院

儘管城大的獨立調查對我校畢業生有較高的評價，而教資會的“角色區分”也明確界定幼師培育乃我校的角色，但教院卻不獲教統局的垂青。2006年6月，教統局常秘羅太為幼兒教育學券制未雨綢繆，特別邀請了幾所院校的代表共商開辦幼師課程——其中包括教資會不給予任何師資培育角色的院校，唯獨是沒有邀請教院出席。（大概也是這個時間，莫禮時教授收到“不合併、不續約”的最後通牒。）我們也想不出教院不獲邀出席這個會議，有什麼教育上、專業上或規劃上的原因。

(七) 今天：美術、音樂、體育

教院最近向教資會提交了2008-09“延續年”的學術發展計劃。“延續年”的意思是現有三年計劃的延伸，學生名額不會有顯著改動。教資會事前也是這樣告訴我們。但在2006年初夏，我們收到的“啓動書”卻把美術、音樂、體育的名額下調到“0”。意味我們的體藝學系要關門，而該系的畢業生正是學校渴求的；我校也是這些科目的獨家院校。我校同仁據理力爭：快將推行的“3·3·4”學制不是要加強高中的術科和培養學生的創意嗎？為什麼要在這個時候取消術科的教育學士課程？但仍是不得要領。有教統局官員指出“3·3·4”學制推出後，於2012年會出現嚴重的教師過剩。這論點真是奇怪：就為了一年的超額要取消一個學系嗎？尤其是官員也承認2012年以後的情況尚無定見。高等院校的專門人才是需要長時間栽培的，應要這樣隨便廢棄的嗎？

順便一提；教資會根據教統局指示，發給各大師資院校分科名額的做法，是2004年新創的。這種「微管理」為教院和三所姊妹院校帶來很多不必要的煩惱。2004年前，每所院校獲分配的名額只是以學歷計算（學士若干名、文憑若干名、等等），沒有再細分科目。院校享有較多自主，更能彈性地回應社會的需要。

總括而言，在上述的規劃程序中，教院的學生名額遭到削減，教統局官員的解釋往往是：學齡人口下降，教師需求減少。過往總有人說教院學生供過於求，就業會有困難，但事實卻跟這些預測有所矛盾。目前本港正缺少合資格的小學教師。教院畢業生的就業率達到99%，而小學裏尚有不少未受訓教師。這些事實說明教師不是供過於求；教統局官員的預測未見準確。

同時，教統局的招標機制坐大也是更多問題的癥狀。這是前財政司長梁錦松一手造成的。自從1960年代教資會成立，政府的教育預算一向分成兩個分辨明確的項目：一個是教資會、一個是教育署。這是教資會得以扮演政府和高等院校之間的緩衝角色的重要支柱。梁司長把兩項經費合成一個“信封”，全數交給了教統局長。這個變動當時未受關注，但卻給了教統局長自由調撥高等教育和中小學教育經費的權力，同時也會令教資會淪為教統局屬下的機構；教統局常秘也成了教資會秘書長的直屬上司。教資會的獨立性和緩衝角色難免腐蝕了。教統局和院校之間也失去平衡，關係傾斜了。這不獨

是教院的問題，更是全港高等教育的問題。

主席先生，從上述事件看，教院明顯受到不同待遇。教院經歷了學生名額的大幅削減，幼教會議又不獲邀參與。整個方向就是要縮減我校的師生人數。我們相信這是因為我們在併校和禁制同事言論兩方面“不合作”。愚見認為，這是一個值得澈查的問題。

最後，還有一點與經費無關的問題。調查委員會的調查範圍未有包含莫禮時教授不獲教院校董會續約是否正如他指稱因為他拒絕併校。大家都知道，教統局除了掌控教院的資源，也決定誰人可以當上教院的校外校董，有權在校長、副校長的任免案投票。為什麼不調查這個續約的問題呢？

多謝主席和各位議員。